

胡适与国际汉学界

桑 兵

内容提要 近代中国学术史上,胡适与国际汉学界的交往之广,历时之长,或可称最。论国别则有法、英、德、美、俄、瑞典、瑞士、日本、朝鲜,论人物则包括夏德、钢和泰、伯希和、伊凤阁、高本汉、斯文赫定、尉礼贤、弗兰克、庄士敦、翟理斯父子、维列、苏熙洵、慕阿德、李约瑟、阿列克、戴密微、恒慕义、傅路德、魏特夫、狩野直喜、小柳司气太等,几乎囊括世界汉学研究机构及各国汉学名家乃至后起之秀。见多识广弥补了胡适学术上的先天不足与后劲不够,使之在议政从政之际保持作为学界领袖必不可少的学术鉴赏力。但国际汉学的巴黎、京都两大主流派成员对于胡适的学术主张与成果不无微辞,这对提倡用西方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胡适及其所引导的主流派颇具讽刺意味。由此可以显现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与得失。

关键词 胡适 汉学 支那学

近代中国学术史上,就与国际汉学界交往之广泛,历时之长久而言,无人能出胡适之右。这种关系,相当典型地反映出国际汉学界各派学者对于中国学术新潮的态度和看法。其中部分史实前人已有所涉及,如胡适与青木正儿的通信,与钢和泰(Baron A. von Staël-Holstein)的交往等。拙文《伯希和与近代中国学术界》则论及胡适与伯希和(Paul Pelliot)的关系。但在胡适研究各种形式的众多成果中,有关情形往往被忽略,不少史实还有待发掘清理。这不仅可从胡适的海外“朋友”方面深入地了解其为人和学术,更有

助于认识近代中外学术界的呼应程度,因为胡适毕竟是近代中国“输入新知”方面的重要代表。而且其“整理国故”虽然并非新知,各方对此又褒贬不一,实际上却是“要照着西方‘汉学家’与受西方‘汉学’影响的日本‘支那学家’的研究方法和范围去作研究”。¹

(一)

胡适在中国学术界崭露头角之际,西方汉学界的概况是:“英美不如德,德不如法”^④。而胡适与西方汉学界的接触,刚好从较薄弱的英美开始。1914年8月2日,尚在康乃尔求学的胡适偶读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报》(*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当年第7期,见有大英博物馆东方图书部的英国汉学家翟来乐(L. Giles)所写《敦煌录译释》一文,及附原书影本。《敦煌录》为数年前在敦煌石室发现的古物之一,“所记敦煌地理古迹,颇多附会妄诞之言,钞笔尤俗陋,然字迹固极易辨认也”。而翟氏的释译“乃讹谬无数”,如以中宗神龙年号为渊名,将录手漏笔误为避讳而据以定年代。胡适看后不禁道:“彼邦号称汉学名宿者,尚尔尔,真可浩叹。随即摘其谬误,作一校勘记寄去。半年后,他收到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书记寄赠的校勘记抽印本,知翟来乐已自认其误,并重新译过,刊于该杂志1915年1月第5卷,又觉得“西人勇于改过,不肯饰非,亦足取也”。^④

涉足汉学,对于康乃尔时代的胡适实为不务正业。但此番试

¹ 牟润孙:《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1977年2月9日香港《伙公报》。

^④ 李思纯:《与友论新诗书》,《学衡》第19期,1923年7月。

^④ 《胡适留学日记》,台北商务出版社1959年版,第323、549页。先此胡适曾看过翟来乐所译《论语》。翟氏中文译名不一,多写为翟林奈,此据《胡适日记》手稿本,1938年10月22日,台北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0年版。

笔,起点不低,翟氏父子相承,在整体水平不算高的英国汉学界可谓出类拔萃,并得到欧陆同行的承认。’这对胡适改换门庭不无作用。当年他转学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选题却是后者完全陌生的《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论》(后以《先秦名学史》为题出版)。胡适在哥大很快结识了德国籍中文教授夏德(F. Hirth),这是当时国际汉学界鼎鼎大名的学者。他生于德国,在柏林等大学学习古典语言学,以研究罗马喜剧获得学位。后进入中国海关,先后在广东、厦门、上海、九龙、淡水、镇江、重庆等地任职。其间业余研究中国问题,曾任上海皇家亚洲学会北华分会(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委员、主席,获普鲁士政府授予的教授衔,并被推举为南德巴燕邦学士院会员。1895年退职后专心中国研究,因在德国占领胶州事件上与李希霍芬(F. P. W. Richthofen)^④意见不合,在国内难以立足,经英国汉学名宿翟理斯(H. A. Giles)等人推荐,1902年起应聘为哥大中国语言文学讲座教授。夏氏论著丰富,水准颇高,尤以广博著称,被视为在美德国籍学者的双壁之一。日本专门研究国际东方学史的石田干之助认为,如果20世纪前半叶称为‘沙畹—伯希和—洛佛尔时代(Chavannes—Pelliot—

¹ 《 博士の讞》,《史学杂志》第46编第8号,1935年8月;梁绳:《外国汉学研究概观》,《国学丛刊》第2期,1942年1月。

^④ 李希霍芬为地质学权威,对于奠定中国地质学巩固基础贡献甚大,但所著《中国》(*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 5 vols. Berlin, 1877_1912)一书,“与德人之中国研究,反有不良影响。盖李希霍芬不能读汉书,竟克成此巨著,因使人觉中国研究与汉籍无关也。李书之引古证今,既多舛误,而雨后春笋之摈弃汉书之中国研究,益无足观。”(莫东寅:《汉学发达史》,北平文化出版社1949年版,第111页;翁文灏:《李希霍芬与中国之地质工作》,《国风》第3卷第12期,1933年12月16日;姚从吾:《欧洲学者对于匈奴之研究》,《国学季刊》第2卷第3号,1930年9月。

Laufer age)”，前此则不妨叫做“夏德时代”¹。

转学不久，胡适就从夏德处获悉，据端方说，哥大所藏中国政府赠送的《古今图书集成》，并非雍正年原版，而是总理衙门仿印。但“雍正初版并不如后日上海图书集成书局所出活板之精，以原板铜字不完，或有所阙，则假借他字以代之，而上海之板校对极精故也。”^④据说夏德是胡适论文的主要指导教授之一，可惜胡适日记后来反而不记专业之事，不知两人交往的具体情形。参加胡适博士论文口试的6位导师中，夏德是唯一懂中文的人，则此番口试未获通过，夏德的意见相当关键。唐德刚称胡适博士学位稽延的最直接原因，是“那时哥大根本没有看得懂他的论文的导师”；夏德的中文“亦不足以读原著”^④，未必属实。因为读原著与审论文并非同一事，胡适的读法也不免格义附会。况且夏德号称渊博，代表作之一又是《中国古代史》(*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1908年哥大出版)，为其在哥大的讲义，由盘古至秦统一，虽然主要依据《释史》，未一一深究基本史料^{1/4}，但在欧美汉学界，当是够格评审胡适论文的有数人物。值得注意的是1916年4月5日胡适在日记中所发的一段感慨：“西人之治汉学者，名 Sinologists or Sinoloques，其用功甚苦，而成效殊微。然其人多不为吾国古代成见陋说所拘束，故其所著书往往有启发吾人思想之处，不可一笔抹煞也。今日吾国人能以中文著书立说者尚不多见，即有之，亦无余力及于国外。然此学 Sinology 终须吾国人为之，以其事半功倍，非如西方汉学家之有种

¹ 中村久四郎：《夏德教授の经历及び学绩》，《史学杂志》第15编第7号，1904年7月；《夏德博士逝》，《史学杂志》第38编第7号，1927年7月。

④ 《胡适留学日记》，第795页。

④ 唐德刚：《胡适杂忆》，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71—89页。

^{1/4} 齐思和：《评马斯波罗中国上古史》，《史学年报》第2卷第2期，1935年；梁绳：《外国汉学研究概观》，《国学丛刊》第1、2期，1941年12月、1942年1月。

种艰阻不易摧陷，不易入手也。”¹似显露其心得与不满。夏德不久即退休，1920年返回德国，从此闭门不出，两人之间毫无联系。胡适后来竭力推崇杜威，却极少言及夏德。1926年他赴欧羁留数月，并曾到德国，虽有经济上的限制，可是从未起顺便参拜师门之意，异乎情理及其‘旧道德楷模’的禀性，除非二人不大投缘。^④

胡适虽未获得学位，归国后却暴得大名，1922年哥大校长函邀其讲中国文学和中国哲学史，为其谢绝。这时的胡适，不仅忙于学术与政治，而且因为已成名流，与欧洲汉学家的交往机会也逐渐增多。当时各国来华人士不少，其中喜欢文学者于1919年组织了文友会，定期举行演讲等活动，有几十人参加。其成员与各国驻华使馆保持密切联系。胡适因此与流亡的俄国东方学家钢和泰和时任帝师的英国汉学家庄士敦(R. F. Johnston)经常来往。前者出身旧俄时代爱沙尼亚贵族之家，大学时就前往柏林研究梵文和印度文学，1900年用德文发表了博士论文。短期访问波恩大学和牛津大学后，进入俄国外交部，然后到彼得堡大学任梵文和印度学副教授。这时其研究兴趣转向中亚及中印关系，特别是佛教领域。1916年，他代表彼得堡科学院去日本，适逢俄国革命，其财产被没收，1917年来到北京，以便进一步研究中印佛教关系，特别是从中国史料里寻证据考迦腻色迦王的年代。经香港大学校长爱里鸮(C. Eliot, 治印度教与佛教)推荐，1918年胡适请钢氏到北京大学教授梵、藏文和古印度宗教史等课程。此事胡适称为香港大学对中

¹ 《胡适留学日记》，第860—861页。

④ 姚从吾：《欧洲学者对于匈奴的研究》，《国学季刊》第2卷第3号。该文称夏氏死于1926年。据1927年7月《史学杂志》第38编第7号石田干之助《F. Hirth . 2. Ein博士 逝》，夏德逝世于1927年1月13日。

国学术的最大贡献。¹ 他在文友会听过钢和泰关于“佛陀传说中的历史的部分”(What is historical in the Buddha Legend)等学术演讲,又共同参与推动文友会倡办的“东方学图书馆”,并经常一起进行学术交际活动,知道钢“是俄国第一流学者”,“他的学业名望是欧洲东方学者都公认的”,了解其从事的汉、梵、藏等文本佛经对勘,对中国大有益处,而国内无人能及,加上港督和美国公使都对钢男爵特别礼重,呼吁“中国应该为世界爱惜此人”,因而对其敬重有加。^④

1921年10月起,胡适为钢和泰的古印度宗教史担任口译,每周二时,这也使他自己“得益不浅”,由此获得的关于佛教经典各种版本与教派关系,印度、锡兰历史传说与佛教的渊源等知识,以及同时向钢氏初学梵文,当是全无佛教知识的胡适为续写中国哲学史后来大胆涉足禅宗史研究的重要契机。此外,钢和泰在东交民巷台基厂奥国使馆旧兵营俱乐部的寓所是当时北京来华外国人士的一个社交中心,胡适于此结识了不少文化人。而钢和泰的许多研究需求,也往往由胡适出面疏通解决。如钢和泰提出要求北大给他一个“东方言语学部”的名义(只是印一些写上“国立北京大学印度中

¹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5年版,第547页;胡适:《南游杂忆》,杨犁编:《胡适文萃》,北京作家出版社1991年版,第630页;Emst Schierlitz, “In Memory of Alexander Wilhelm Baron von Stael- Holstein”, *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华裔学志), Vol. , fasc. , 1938. 后文称钢和泰到北大任教在1922年,但据胡适1937年3月16日日记:“民国七年,我因 Sir Charles Eliot 的介绍,请他到北大来教梵文,并教印度宗教史。他的古宗教史是我替他口译的,我们合作两年,我得益不少。”则当在1918年。胡适口译古印度宗教史课,从1921年10月起。1923年后黄树因继之。黄不幸夭亡,江绍源接替(《胡适日记》手稿本,1923年9月20日)。

^④ 《胡适的日记》,第44、63、65、66、94、218—220、228—229页。

亚学部’的信封信纸),以便与欧洲各东方学研究机构接洽,为北大索取各种书报,并便于在中国找人参与巴黎、伦敦、柏林东方学者的整理《佛藏》事业,胡适即代向蔡元培提出申请,并主动建议将久同虚设的图书馆“东方室”交由钢管理,断言“将来一定大有成绩”。胡适还答应设法为北大谋藏文的《佉藏》,作为其校勘《佛经》的底本,甚至借钱为钢和泰付款买书。由于北洋政府财政上限制北大等原因,胡适几经努力,购置藏文《佉藏》等事未克成就。^④为此,钢和泰似认为北大不能满足其研究条件,1927年流露出欲赴东京之意。与之经常切磋梵文的陈寅恪函告傅斯年,希望中山大学“寄彼千元,留其在京”。傅感到“此恐非根本解决之策”,欲请其南下广州,带助手带学生,并可任意买书,托胡适代为说项。^(四)刚好此时哈佛大学计划在北京设立附属该校的中印关系研究所(Harvard Institute of Sino-Indian Research),钢和泰被任命为所长。此事或与始终和美国在华文化事业关系密切的胡适不无联系。^¼

在胡适的帮助下,钢和泰的研究顺利进行,并对中国学术界产生积极影响。1922年4月,胡适看了钢和泰所写《陀罗尼与中国古音》一文,知其引法天的梵咒译音证当时的音读,“很多可惊的发现”;于是亲自译出,刊于由他主编、次年1月出版的北大《国学季刊》第1号。该文首先在中国提出,应仿照西方学者推求印欧原始

¹ 《胡适的日记》,第228—229页。

^④ 《胡适的日记》,第237—238、351页;1952年12月8日,胡适为购买藏文《佉藏》事,致函单不庵;次年1月25日又与钢和泰引介的一位蒙古人就所带藏文《佉藏》之《佉藏》议价,因索价过高不成(《胡适日记》手稿本)。

^(四)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年版,第455页。

^¼ E. Schierlitz, *op. cit.* 燕京大学改革国文系,与哈佛大学合办研究所,以及清华学校的改革和筹办国学院等事,均与胡适有联系。

语言方法,用比较语言学推求中国原始语言,并指出从发音学重构中国古音,存在中文象形会意,不用音标,与汉语最接近的藏、缅、暹语均无古书等两大困难,以及用方言与日本、安南、朝鲜文中的汉字读音比较,从古韵表考见韵母分类,和中外文互译对音等三条研究途径,提示中国学术界注意欧洲学者伯希和、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等人的研究进展,强调研究古译音对于中国音韵沿革史、印度史、中亚史的至关重要。受此影响,《国学季刊》第2号发表汪荣宝的《歌戈鱼虞模古读考》,就外国古来传述中国语观其切音,就中国古来音译外国语反求原语发音;第3号又发表潘尊行的《原始中国语试探》,进一步讨论钢和泰文所指出的中国古音不易推求的两个原因,分析以章太炎、黄侃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音韵研究的成就和局限,指出运用比较语言学的必要,引起不同意见的辩论。魏建功后来总结道:“历来研究古音的人们都注意在死材料,更不注意他种语言的参考,这是新近的方向,用梵音来考订古音,而大辩论从此开始。”¹ 除知对音为治古音的新材料外,钢文更积极的意义在于使国人知道高本汉的成绩,由此开始大量翻译介绍^④,中国音韵学因而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而胡适译介钢和泰的论文,实为人称近代中国语言学“高本汉时期”肇始的重要契机。

钢和泰的主要贡献还在佛教研究。“其寓中收藏藏文佛经,及大小各种佛像画卷等甚多,终年闭门研究古籍,澹如也。”他“据藏文及梵文佛经,以校正中国旧译佛经之讹误,多所发明”。^(四)其中最著名的成果,是192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宝积经迦叶

¹ 魏建功:《古音学上的大辩论——歌戈鱼虞模古读考引起的问题》,《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1卷第1号,1926年10月。

^④ 齐佩:《中国近三十年之声韵学》,《中国学报》第1卷第2期,1944年4月。

^(四) 钢和泰撰,吴必译:《一七三四年班禅喇嘛告谕译释》译者按语,《学衡》第43期,1925年7月。

品梵藏汉汉晋唐宋六种合刊》，以及 1933 年北平国立图书馆和清华大学出版的藏、中文《大宝积经迦叶品集注》。在他的主持影响下，中印关系研究所收集了大量各种文字和版本的佛教喇嘛教经典及有关文献文物，培养了一批从事此项研究的中外学者，很快成为国际知名的东方学研究中心，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访问者。有人指出：“钢和泰最早将印度和中亚学引入中国，其在中印关系领域的研究，有不少在中文书刊发表，极大地刺激了该国有特殊能力从事这种文献和语言研究的学者的类似兴趣。”¹可以说，钢和泰的存在，是近代中国学术界沟通国际东方学及汉学的重要媒介，对于整体上促成中国学术进入近代世界起到重要作用。1923 年，钢和泰被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1927 年又被聘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名誉通信指导员，1930 年担任《燕京学报》编委，表明中国学术界对其学术贡献与地位的公认和礼重。而胡适在中国为世界学术界爱惜此人方面，当居首功。^④除 1928—1929 年前往美国担任哈佛大学中亚研究讲座教授外，钢和泰一直在中国从事研究。虽然因研究兴趣不尽相同，胡适又太忙，两人来往较疏，但仍不时互有探访，保持良好交谊。1937 年钢和泰病重入住北平德国医院，他要求不向外透露病情，以免惊扰朋友，而胡适是少数前往探视的知情者。数日后钢不幸逝世，胡适闻讯，大为感伤，称赞他“是一个纯粹学人，终身寻求知识，老而不倦”，并在出席钢和泰的奠仪时“不觉堕泪”。^(四)

胡适与清废帝溥仪的老师庄士敦也早有交往，两人经常共同

¹ E. Schierlitz, *op. cit.*

^④ 《研究所国学门重要纪事》，《国学季刊》第 1 卷第 2 号，1923 年 4 月；孙敦恒：《清华国学研究院纪事》，葛兆光主编：《清华汉学研究》第 1 辑，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27 页。

^(四) 《胡适的日记》，第 547—548 页。

参与一些中外学术文化教育界的交流应酬活动。胡适看过庄关于董鄂妃非董小宛的考证文章,觉得引证甚博,又曾参观其在当时京城也号称丰富的私人藏书,知其遍游中国,很有学问。不过胡适与之共鸣最多的是对传教士的看法。胡不信教,对教徒虽无偏见,对反教会者却不乏好感。而庄士敦“最恨传教士,他著的书之中,有两种是批评在中国的传教运动的”。英美考察教育团来华考察教会教育时,庄与胡适等人一起,激烈地表达反对意见。1922年5月胡适入宫见溥仪,引起普遍不满。此事与庄多少有关,入宫前胡适还专门向其打听宫中情形。特别是1924年冯玉祥的国民军驱逐溥仪出宫,胡适公开表态反对,激犯众怒,博得庄士敦的好感。而且胡适不相信人们对溥仪密谋复辟的指责,却深信庄士敦等“并没有什么复辟谬论”。不过,庄胡之间的关系不像与钢和泰那样纯粹。1925年,中英庚款咨询委员会成立,胡适是中方委员之一。次年该委员会派代表团来华考察,庄士敦为秘书。在双方利益尖锐抵触的情况下,庄士敦向主张完全相反的港督兼香港大学校监金文泰(C. Clementi)将胡适描述为“一个名过其实的人,他有时表现出具有过人的才智,实际上绝非如此……当他喜欢的时候,他可以在某些社交场合表现得很有魅力。不过,他对美国的支持远远高于他对英国的支持”^④。1926年胡适赴欧,两人还有所接触。

(二)

这一时期各国驻华使馆多用汉学家担任相关职务,胡适认识

¹ 《胡适的日记》,第45、218、359页;《胡适来往书信选》,第272、275页。

^④ 程美宝:《庚子赔款与香港大学中文系》所引牛津大学藏金文泰档案,《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了德国使馆的文学顾问(胡适称为头等参赞)尉礼贤(R. Wilhelm)和苏俄外交代表团的伊凤阁(A. I. Ivanov),两人均为欧洲汉学名家。尉礼贤1899年作为牧师来华,因仰慕孔教,取今名,字希圣。他在华20余年,对中国传统文化深慕不已,自称山东人。义和团事变,他为中国辩护。后在青岛创办礼贤书院,凡入校学习德文者,须精通中文。民初与流寓青岛的遗老们组织尊孔文社,聘劳乃宣主持,日与讲论经义,并在其辅佐下翻译儒教经典。¹本来他想在华传播西方教义,但据说从未吸收一人入教,反而不遗余力地向欧洲宣传中国文化,以致有人批评其“比中国人还要中国化”^④。1921年,尉礼贤趁战后欧洲本位文化自信动摇之机,回国到各地演讲,鼓吹中国文化,受到热烈欢迎。当时中国留德学生描述:“德国思想界,有两大潮流,一为新派,一为旧派。所谓新派,大都出自哲学美术与诗学者,彼辈自欧战后,大感欧洲文化之不足,而思采纳东方文化,以济其穷,于是言孔子、释迦哲学者,皆大为社会所尊重,如凯热几林,如尉礼贤,如史奔格列儿,皆其例也。所谓旧派者,仍尊崇自然科学万能,不为时潮所动摇……此两大潮流中,新派极占势力,所谓旧派者,几无声息。此种现象,与吾国适反。我国言新者大都以驳斥孔子为能,而在德国,则深以能知孔子哲学为幸,甚至以辜鸿铭为欧洲之救星。可见天下学问,其价值极为相对,合乎当时之人心,则价值便高,反乎当时之人心,其价值便低。今日国内盛称之杜威、罗素,安知几年后,其学问不为人所吐弃,而奉之者俨如上帝,此亦未免太过矣。”^④这不仅道出中德两国思想倾向

¹ 劳乃宣:《劬叟自订年谱》,《中国历代名人年谱汇编》第1辑之53,台北广文书局1971年版,第49—54页。

^④ 郑寿麟:《尉礼贤的生平和著作》,国立北平图书馆编:《读书月刊》第1卷第6号,1932年3月。

^④ 魏时珍:《旅德日记》,《少年中国》第3卷第4期,1921年11月。

的差异,也指明了胡、尉二人的认识分歧甚至对立的根源。

胡适不赞成儒教,对崇儒尊孔的中国人乃至日本人无甚好感,但对由西方文化背景而来的笃信儒学者如辜鸿铭、尉礼贤等,却能容忍几分。这大半因为他以为后者出自真心,且不失君子之风。1922年,尉礼贤回到中国,任职于德国驻华使馆。是年5月,胡适识之于德使馆,知其精通汉文,已将十几部中国古书译成可读的德文,并曾试译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¹后来又在文友会听尉礼贤演讲《易经》的哲学,虽认为“大旨用我的解释,没有什么发明”,但觉得尉氏能赏识其对“太极”的一点新义,“亦是难得”。在学术上,胡适与尉礼贤异趣,而自认为钢和泰的同道。他曾与钢和泰等人谈及:“尉礼贤对于中国学术,有一种心悦诚服的热忱,故能十分奋勇,译出十几部古书,风行德国。”他们自己则“太多批评的态度与历史的眼光,故不能有这种盲目的热忱”,但也自有奋勇处。^④1923年,尉礼贤受聘到北京大学任教,并参与北大国学门的活动。归国后在法兰克福创办中国学院,“专宣传中国文化,其意在于使德国感觉他们自己的文化的缺点”;成为德国独立研究中国学及沟通中德文化机关的起点。1926年10月,正在欧洲的胡适应邀前往法兰克福出席该院第一次秋季大会并发表演讲,尉礼贤亲自到车站迎接。虽然胡适在剧院观看上演尉礼贤所译中国戏“梦蝶”和“劈棺”,觉得不坏,仍认为“其方法则一意盲目地说中国文化怎样好,殊不足为训”^(四)。其实旁观者看来,胡适的拼命学西方与尉礼贤的

¹ 时任柏林东方语言学校教授的汉学家儒傅尔克(A. Forke)也有意翻译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后此书由尉礼贤之子译成出版(《胡适日记》手稿本,1933年12月31日)。傅尔克专治中国哲学,曾任美国加州大学教授,与夏德、劳佛(K. B. Laufer)齐名。

^④ 《胡适的日记》,第389、441页。

^(四) 《胡适日记》手稿本,1926年10月24日。

拼命学中国,均属反常,“各个民族,总要能保持他的特性才好”¹。

胡适与伊凤阁相识,是在1922年8月李大钊宴请苏俄外交代表之时。伊从旧俄时代起,已是有名的汉学家,任教彼得堡大学时,指导过留学俄国的高本汉,尤其在号称绝学的西夏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席位。^④十月革命后,苏俄的中国研究分成新旧两派,旧派沿袭欧洲汉学传统。30年代以前,在全苏东方学会会长、新东方学奠基人巴尔托德(W. Barthold)和科学院常任书记鄂登堡(S. F. Oldenburg)的主持下,旧派学者得到善用,成为主导,各种学术活动乃至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尚能正常进行。正是在此背景下,已是彼得堡大学正教授的伊凤阁随越飞(A. A. Joffe)前来北京。1923年,他被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国学门聘为导师,指导研究西夏国文字与西夏文化,同时开设西夏语课程,并担任歌谣研究会的特别指导^④,与同是国学门成员的胡适时有接触。1923年12月,胡适任编委会主任的北大《国学季刊》刊载伊凤阁的论文《西夏国书说》,认为西夏文是由《说文》篆字推演而成。不过,苏俄汉学界的旧派学者对胡适等人倡导文学革命和整理国故的欧化偏向不以为然,伊凤阁似也有所保留。1926年6月,国学门在龙头井公教大学召开第4次恳亲会,并欢送即将赴欧的胡适。席间胡适发表对于整理国故之最后意见的演讲,针对许多青年争相研究国学的状况,以及回应陈源等人对此的批评,宣称:“我们所提倡的‘整理国故’,重在‘整理’两个字……是用无成见的态度,精密的科学方法,去寻求

¹ 魏时珍《旅德日记》所引德国数学教授野蒲斯坦银语,《少年中国》第3卷第4期。

④ 聂斯克(N. A. Nevskii):《西夏语研究小史》,《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西夏文专号)第4卷第3号,1932年1月。

④ 《研究所国学门纪事》,《国学季刊》第1卷第3号,1923年7月;《国学门通告》,《北京大学日刊》第1389号,1924年1月18日;《歌谣研究会常会并欢迎新会员会纪事》,《北京大学日刊》第1406号,1924年2月28日。

那已往的文化变迁沿革的条理线索,去组成局部的或全部的中国文化史。不论国粹国渣,都是‘国故’。我们不存什么‘卫道’的态度,也不想从国故里求得什么天经地义来供我们安身立命”;以免被误解为“保存国精”、“发扬国光”。他断言国学是条死路,其中经学、文学、哲学都没有什么宝贵东西,青年应尽量少走,而未经科学方法训练的人也不能走和不配走,进而呼吁“少年朋友大家要走生路!”得到在座的马幼渔、徐旭生等附和赞同,叶瀚、伊凤阁却有异议。伊婉转表示:“胡先生主张用新方法甚对,但其悲观不敢同意。中国学问材料太多,外人要研究非常困难。中国人用自家方法整理令人明白,亦甚要紧。”并针对徐旭生批评中国传统历史文学观念的说法予以指正:“文学是美,历史是教科书,乃是十八世纪外国人犯的病,这不是中国人的病。”¹ 外国汉学家与中国新学家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常常读出不同的东西,如沙畹认为《史记》的客观叙述,在西方史学中罕见,实在值得从各自的方法本身深思反省。

除了和长期住户的深交,胡适还与一些来访的匆匆过客建立联系。1921年10月,胡适在法国《敦闻报》主笔孟烈士特(A. Monestier)的宴席上与瑞士汉学者戴密微(P. H. Demieville,后入法国籍)相遇。戴是沙畹的弟子,少年时即得到沙畹、马伯乐(H. Maspero)等汉学名家的指教,1920年考进河内法兰西远东学院。^④ 来北京时已能读中文书,看过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有意译成法文,但尚未能自信。两天后,胡适在原康乃尔同学王彦祖的宴席上与之再会,这次戴是主宾,陪客还有辜鸿铭、孟烈士特、徐擘等人。席间辜鸿铭对两位法国人大加调侃,痛斥法国政府授博士

¹ 《研究所国学门第四次恳亲会纪事》,《北大国学门月刊》第1卷第1号。有关苏俄中国研究的变化及其与中国学术界的交往,另文详论。

^④ 耿升整理:戴密微,《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6期。

学位给徐世昌,令宾主十分尴尬。¹ 但这一机缘却促成戴密微于1923年至1924年间,先后在《柯内远东法兰西学校校刊》(*Bulletin de L'Ecole Francaise d'Extreme-Orient*)载文介绍胡适关于井田制的反传统见解及其章学诚研究,并探讨胡适的新诗。^④ 戴密微后在厦门大学任教两年,1926年赴日本,曾任日佛会馆学监。^(四) 1927年5月,胡适因国内政局不稳而羁留日本,在奈良旅馆中与之重逢共餐,同席的还有英国的爱里鹑和法国的印度及佛教学家列维(S. Levi)等人。^¼ 后者曾到北京大学讲学。战后巴黎学派诸大师凋零殆尽,戴密微成为重镇,胡适曾通过王重民与之联系。^½

研究中国美术史的瑞典斯托洪(Stockholm)大学教授西伦(O. Siren),著有多种关于中国古代建筑、雕刻、绘画的书籍,他于1922年3月认识胡适后,曾就中国美术长于表现精神意境等观念交换意见,胡适还为其演讲东西绘画特征担任翻译。西伦所说在蚌埠和几位外国人士计划组织古物学会,引起胡适对近年中国古物出土甚多一事的注意。几天后,胡适便与中国考古事业发生联系。1926年胡适访英,与之重逢,西伦听了胡适的讲演,又陪同其参观博物馆的玛雅文化藏品,认为其中有与中国相似处。但胡适不大相信。^¾

胡适与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交往,堪称“中国学史上的一樁很

¹ 《胡适的日记》,第237、239页;胡适:《记辜鸿铭》,《胡适文萃》,第656—659页。

^④ Ó Ê · ¼ Z Í 著,内藤耕次郎、内藤戊申共译:《最近五十年支那学界の回顾》,《东洋史研究》第1卷第1号,1935年1月,第6号,昭和11年8月。

^(四) 耿升:《戴密微和吐蕃僧诤记》,《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85年第1期。

^¼ 胡适:《衡游杂忆》,《胡适文萃》,第630页。

^½ 《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90页。

^¾ 《胡适的日记》,第289、292、297、306、313页;《胡适日记》手稿本,1926年10月17日;莫东寅:《汉学发达史》,第153页。

巧的因缘”。后者在国际汉学界声望仅次于伯希和,而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最大,尤其在音韵学方面,几乎独霸了半个世纪。1920年,高本汉在法国《亚洲学报》(*Journal Asiatique*)载文《论原始的中国文》(*Le Proto-chinois, langue flexionnelle*),讨论中国古代代名词的变化,其方法、材料和得出的结论,与胡适留学时代发表的《尔汝篇》、《吾我篇》几乎一样。当时在莱比锡的林玉堂看过高本汉寄赠的抽印本,诧为奇事,即复函相告。高虽然因生性骄傲而颇感惊诧失望,却由此产生结交之意。1922年11月,他从美国回欧洲,路过上海,本想到北京拜访胡适以及通过安特森博士(J. G. Anderson)了解的其他中国学者,不幸因病不能北上,遂致函胡适,询问有关中国学者的古文字学近著、学术机构的汉学期刊以及白话运动的主要口号等问题,并寄赠前年论文的单行本。胡适知其“为欧洲今日中国学的大师”,写长信回复。¹两人从此订交。胡适前此译载钢和泰论文,在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以高本汉为代表的欧洲汉语研究方面已起到积极作用。此后,高本汉陆续将自己的著述寄赠胡适,而胡适则设法将其中重要部分转介国内学者。不过,胡适的小学功夫甚浅,仅凭聪明和无师自通的科学方法治此清代学者成就最大的专门,多半是参“野狐禅”^④。而高本汉治古汉语,语法乃

¹ 《胡适的日记》,第514—515页。

④ 胡适曾坦白道:“考据之学,其能卓然有成者,皆其能用归纳之法,以小学为之根据者也。王氏父子之《经传释词》、《读书杂记》,今人如章太炎,皆得力于此。吾治古籍,盲行十年,去国以后,始悟前此不得途径。辛亥年作诗经言字解,已倡‘以经解经’之说,以为当广求同例,观其会通,然后定其古义。吾名之曰‘归纳的读书法’,其时尚未见《经传释词》也。后稍稍读王氏父子及段(玉裁)孙(仲容)章诸人之书,始知‘以经说经’之法,虽已得途径,而不得小学之助,犹为无用也。两年以来,始力屏臆测之见,每立一说,必求其例证。”(《胡适留学日记》,第1064—1065页)。陈寅恪曾对胡适的《尔汝篇》、《吾我篇》隐加讽喻。

是最弱的一面,主要贡献还在语音。这方面他与钱玄同、林玉堂、赵元任等专家也保持联系。钱从1922年起即在北大讲课时引用高著的材料,而系统仍旧。¹ 胡适之功,主要在于推动,实际输入则由语言专家完成。如国内最早刊登的高本汉著述译文,为1923年7月北大《国学季刊》第1卷第3号的《警马斯贝罗论切韵之音》。此文原发表于《通报》,回应马伯乐《论唐代长安的方音》(Le Dialecte de Tchang-ngansous Las T'ang)中对其《中国音韵学研究》一书的论难,并对自著做出重要修正,后寄赠胡适。胡因病,瞩林玉堂代译。由此开端,高本汉的重要著作陆续被译成中文,得到新学者的一致赞誉。而国内学界围绕高氏著述展开的讨论及修订,进一步确立了其总原则对中国音韵学研究的支配地位。

高本汉在汉语音韵学上的贡献,最能支持即使整理国故科学方法也较传统方式为优的主张,因此胡适屡屡予以鼓吹。1928年9月,胡适撰《治学的方法与材料》称:“近年一位瑞典学者珂罗倔伦(即高本汉)费了几年的工夫研究《切韵》,把二百六部的古音弄的清清楚楚。林玉堂先生说:‘珂先生是《切韵》专家,对中国音韵学的贡献发明,比中外过去的任何音韵学家还重要。’(《语丝》第四卷第二十七期)珂先生的成绩何以能这样大呢?他有西洋的音韵学原理作工具,又很充分地运用方言的材料,用广东方言作底子,用日本的汉音吴音作参证,所以他几年的成绩便可以推倒顾炎武以来三百年的中国学者的纸上工夫。”用这一“三百年的古韵学抵不得一个外国学者运用活方言的实验”为例,胡适呼吁乱钻故纸堆的青年及早回头,先在自然科学的活路上有了好成绩,再以余力整理国

¹ 魏建功:《中国音韵学研究——一部影响现代中国语文学的著作的译本读后记》,国立中央图书馆:《图书月刊》第1卷第6期,1941年9月30日。

故,“那时候一拳打倒顾亭林,两脚踢翻钱竹汀,有何难哉!”对于高氏的其他著作,胡适也予以提倡。1926年他收到高本汉寄来的《左传真伪考》,在太平洋舟中读完并节译大要,欲请顾颉刚、钱玄同看后发表。后因故耽搁。而陆侃如和卫聚贤则全文译出,胡适阅后写《左传真伪考的提要及批评》的长序,对高氏以语法学的研究考证古书的创举表示钦佩(胡适自己曾有此主张而未及实行),并进而与作者及为中文版作跋的卫聚贤讨论得失。^④

1928年,胡适因夏剑丞送来两本关于古音通假的新著请其作序批评,用一个月时间“消遣”地阅读清儒音韵书及高本汉著作,并主要参照引申高著写了篇《声考》,欲补其不注意汉以前古音的不足。初稿写定后,忽收到高发表于《皇家亚洲学会杂志》当年10月号的近作《中国古音问题》(Problems in Archaic Chinese),所用材料、方法和得的结论,又几乎完全与之相同,不禁惊为奇事。^(四)后来重审《水经注》公案时,他引此事为例,说明学术史上此类巧合并非罕见,“凡用同样方法研究同样材料,当然可得大致相同的结果”^{1/4}。高本汉晚年称“只有爱护本国文物历史而从事研究的中国学者是真正的知音”^{1/2},胡适无疑当在其列。

此外,一些来华的欧洲汉学家与胡适仅仅一面之识,却也透露出有价值的学术信息。如苏俄专治中国哲学的柏烈伟(S. A.

¹ 《胡适文存》第3集,上海亚东图书馆,第203—205页。

^④ 据《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1卷第7、8号合刊《论左传之真伪及其性质》,高本汉另寄一单行本给赵元任,赵转赠李济。卫聚贤见后欲读,因外语不好,请教同学陆侃如,遂合译之。由陆口译,卫笔受,并由赵元任校正。

^(四) 《声考》,《胡适文存》第3集,第225页;《胡适日记》手稿本,1928年12月1日。

^{1/4} 耿云志等编:《胡适书信集》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64页。

^{1/2} 董同 译:《高本汉诗经注释》作者赠言,台北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印,1979年再版。

Polevoy) 和专治蒙古西藏文的潘克拉托夫(B. Pankratoff), 前者要求将胡著《中国哲学史大纲》译成俄文, 得到允准; 后者则告以正将《秘史》译成俄文。¹ 还有一些人士, 严格说来并非汉学专家, 但与中国研究的近代学术发展颇有关系, 如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 有欧洲第一汉籍收藏家之称的法国汉文学者罗道尔(Robert des Rotours), 多次赴中国西南探险、熟悉当地民族风俗习尚的美国人类学者洛克(J. F. Rock) 博士, 留华逾 50 年、收藏大批古物、并著有《中国艺术综览》、《历代著录吉金目》、《历代著录画目》等书的美国人福开森(John C. Ferguson), 治中国哲学的燕京大学文理科科长博晨光(L. C. Porter), 研究基督教史的耶鲁大学神学教授赖德烈(K. S. Latourette, 后任美国学会理事会促进中国研究委员会委员), 任教燕京大学多年、研究基督教在华历史的瑞士学者王克私(Philippe de Vargas) 等。^④ 斯文赫定曾多次来华探险调查, 后更与中国学术界联合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 所写报告, 风行世界。他还是瑞典国家学会 18 会员之一, 可以推举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 20 年代末, 曾运动提名中国作家, 以沟通感情, 便于考察活动。据丁文江函告, 意中人之一便是胡适。后斯氏又向火车上邂逅的胡适当面提及, 但希望胡自己将著作译成英文。胡适对其来意似有误解, 态度是: “如果他们因为我提倡文学革命有功而选举我, 我不推辞; 如果他们希望我因希冀奖金而翻译我的著作, 我可没有那厚脸皮, 我是不配称文学家的。”^(四) 王克私也是文友会会员, 1921 年 6 月拜访胡适, 后又来函及登门采访有关新文

¹ 《胡适的日记》, 第 125—126 页。

^④ 《胡适的日记》, 第 292、297、305、355、359 页; 《胡适日记》手稿本, 1929 年 12 月 15 日, 1936 年 1 月 3 日。

^(四)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第 444 页; 《胡适日记》手稿本, 1929 年 2 月 26 日。同时斯文赫定还拟提名鲁迅。

化运动之事。1922年2月15日,在文友会讲演《中国文艺复兴的几个问题》(Some Aspects of the Chinese Renaissance),这应是欧洲人首次以学术眼光评论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引起与会者的热烈讨论。丁文江持梁启超之见,认为中国文艺复兴只限于清代汉学,不当包括近年的文学革命运动。胡适则反对此说,“颇助原著者”。后来王克私再就文学革命运动采访胡适,在胡的帮助下,修改成同题长文,刊登于1922年4—6月上海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分会的《新华学报》(*The New China Review*)。两人因此交往多年,成为很熟的朋友。¹抗战期间燕京大学教职员遭受日军迫害,外籍教员或亡走或被囚,王克私尽力照管校产和同仁,起了很好的作用。^④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胡适与对中国地质和古生物学、考古学影响甚大的加拿大解剖学者步达生(Davidson Black)、瑞典地质学者安特森、美国古生物学者葛利普(A. W. Grabau)、法国地质学者德日进(Pere Teilhard de Chardin)等人的交往。他曾经以这些外国学者的成就,说明西洋科学方法对于整理国故的重要:“一个瑞典学者安特森发见了几处新石器,便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一个法国教士桑德华(Pere E. Licent)发见了一些旧石器,便又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北京地质调查所的学者在北京附近的周口店发见了一个人齿,经了一个解剖学专家步达生的考定,认为是远古的原人,这又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万年。向来学者所认为纸上的学问,如今都要跳在故纸堆外去研究

¹ 《胡适的日记》,第96、255、263、267—268、280页;《胡适日记》手稿本,1923年4月3日,1953年3月23日。胡适虽参与意见,但认为此文“实不甚佳”,次年4月,复用英文自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The Chinese Renaissance*),分为宋学、王学、清学、新文化4期。

^④ 梅贻宝:《燕京大学成都复校始末记》,《传记文学》第44卷第2期,1984年2月。

化运动之事。1922年2月15日,在文友会讲演《中国文艺复兴的几个问题》(Some Aspects of the Chinese Renaissance),这应是欧洲人首次以学术眼光评论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引起与会者的热烈讨论。丁文江持梁启超之见,认为中国文艺复兴只限于清代汉学,不当包括近年的文学革命运动。胡适则反对此说,“颇助原著者”。后来王克私再就文学革命运动采访胡适,在胡的帮助下,修改成同题长文,刊登于1922年4—6月上海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分会的《新华学报》(*The New China Review*)。两人因此交往多年,成为很熟的朋友。¹抗战期间燕京大学教职员遭受日军迫害,外籍教员或亡走或被囚,王克私尽力照管校产和同仁,起了很好的作用。^④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胡适与对中国地质和古生物学、考古学影响甚大的加拿大解剖学者步达生(Davidson Black)、瑞典地质学者安特森、美国古生物学者葛利普(A. W. Grabau)、法国地质学者德日进(Pere Teilhard de Chardin)等人的交往。他曾经以这些外国学者的成就,说明西洋科学方法对于整理国故的重要:“一个瑞典学者安特森发见了几处新石器,便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一个法国教士桑德华(Pere E. Licent)发见了一些旧石器,便又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北京地质调查所的学者在北京附近的周口店发见了一个人齿,经了一个解剖学专家步达生的考定,认为是远古的原人,这又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万年。向来学者所认为纸上的学问,如今都要跳在故纸堆外去研究

¹ 《胡适的日记》,第96、255、263、267—268、280页;《胡适日记》手稿本,1923年4月3日,1953年3月23日。胡适虽参与意见,但认为此文“实不甚佳”,次年4月,复用英文自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The Chinese Renaissance*),分为宋学、王学、清学、新文化4期。

^④ 梅贻宝:《燕京大学成都复校始末记》,《传记文学》第44卷第2期,1984年2月。